

谈古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教学定位*

尹振球

(廊坊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廊坊,065000)

摘要: 忽视古希伯来文学对西方文学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倾向性问题。高等学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增加“古希伯来文学与早期基督教文学”一章。只有补上这条线,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西方文学内在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将由此而出现新的局面。

关键词: 《圣经》;古希伯来文学;外国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 I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5)03-0152-05

—

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文学与古希伯来文学,这一点早已得到外国文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在西方文学的教学中始终只让学生接触古希腊文学这一个源头。倘若外国文学的教学比较完整,在西方文学的教学结束之后还能让学生走马观花进东方文学的大门一瞥,学生或许能远远看到古希伯来文学一个模糊的侧影。但是,古希伯来文学对东方文学并没有产生它对西方文学那样的影响,它与后世的东方文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把它放在“东方古代文学”中,她就成了纯粹的木乃伊。然而实际上它是鲜活地存在着,直到今天仍是生机勃勃,只是它的这种生命力是体现在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中。

为什么要把古希伯来文学放在“东方古代文学”中呢?就表面的原因看来,是因为地域的关系,因为产生《旧约》的巴勒斯坦在亚洲。但是,实际上这里却存在更为复杂的原因。今天大概谁也不会把古希腊文学或者是它的一部分从西方文学中分离出来纳入东方文学的范畴,实际上古代希腊世界是包括环地中海的广大区域在内的,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等,都在其中。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在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整个希腊哲学就是发源于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和爱非索。翻开希腊文学史,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伊奥尼亚人,荷马史诗就是产生于伊奥尼亚,而后才流传至整个希腊世界^{[1](P104)};稍后于荷马的重要诗人、《神谱》和《工作与时日》的作者赫西俄德祖籍也是小亚细亚;杰出的抒情诗人品达是移民希腊的东方民族腓尼基人卡德摩斯的后裔。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城市哈利卡尔纳索斯,他的《历史》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被人们公认是一部非凡的文学作品。而希腊化时期整个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又转移到了北非的亚历山大城,一大批文化巨人和众多的文化成就就是从那里出现的。如果仔细去做一番考究,我们还会发现有许多古希腊文学家如果按今天的地域来划分或者属于亚洲或者属于非洲。但是,为什么人们不会去尝试要把古希腊文学划入东方文学的版图呢?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古希腊文学与西方文学存在着血肉相连的渊源关系,认为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艺术血肉直接哺育着西方文学的成长。具体来说,人们认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自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如一条思想之流贯穿始终,我们把它看作是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主流精神。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人们才超越了地域关系不顾古希腊文学中的东方色彩而把它看作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 收稿日期:2005-03-01

作者简介:尹振球(1964—),男,安徽宿松人,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可是,对于古希伯来文学则不是这样。当我们声言“古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人云亦云。发现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在东方,这或许是令人快慰的事,所以着意强调古希伯来文学的东方性质,或许与近代以来东西文明冲突的过程中因东方文明处于劣势而引发的一种微妙的文化心理有关。但是,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Vor-Meinungen)的干扰。”^{[2](P343)}的确,这种“前见解的干扰”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我们对古希伯来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内在联系缺乏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希伯来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及其文化精神缺乏基本的理解和认同,我们对它一直都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正是对希伯来文学的隔膜才使我们看不到它与西方文学的内在联系。

于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中一个严重的“事件”: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竟然完全忽略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古希伯来文学。这一“忽略”,决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西方文学教学中留下了一个知识点,而是从支撑整个西方文学大厦的两大支柱中抽出、拆除、抛弃其一!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具体而言,首先是造成外国文学界以及高校相关学科的师生长期以来对希伯来文学及其文化精神的隔膜;其次,西方文学内在的张力本来就是由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这两条主线的对立、冲突、融合与消长而构成的,失其一端则面目全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不能准确地把握西方文学内在的发展脉络,也不能深入地认识西方文学内在的精神实质。再次,由于人文主义是与希伯来精神相对而存在,他们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却又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所以单方面肯定人文主义的结果就会连人文主义本身也被歪曲,这一点在我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作家的理解评价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我们既然难以理解他们身上的矛盾性,实际上也就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忽视、回避西方文学中的希伯来精神,实际上已经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时空中,宗教也是有它的位置的,不过古代中国的宗教不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传入的佛教,都是多神论宗教,强调人自己的修炼与觉悟,人能成神、成仙或成佛,神人界限不很分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们都是人本宗教。尤其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中,不论是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庸态度,还是明确否定神佛存在,主张“神灭论”、“无神论”的思想倾向,都是对宗教信仰的有力冲击,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化的人本性质。犹太教与基督教则是惟一神论宗教,它极力强调人的局限,包括人的良知和理性的局限。人仅靠自己无法确立生命的根基和人生的意义,更不可能成神,因为上帝是惟一的。所谓人的“原罪”即人的人性在现实意义上的根本性缺陷,惟有通过对神的信仰才能“因信称义”。与多神论宗教相比,惟一神论宗教则真正是以神为本。所以,同样都是外来宗教,中国能接受佛教却难以接受基督教,这或许就是原因之一。法国汉学权威谢和耐在研究明清之际基督教进入中国引发的“礼仪之争”以后,明确地提出西方源自古希伯来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不是仅仅在某些方面,而是在一种悠久传统中,使人熟悉的所有方面都相差悬殊”^{[3](P225)}。他甚至提出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接受基督教。当然,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基督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里更明确地意识到中西文化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正是这一差异造成我们对古希伯来文学和基督教文学的误解与忽视,对这种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发展之间无比重要而又无限丰富的内在联系的误解与忽视。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既要面对多元性,又要强调普世性。所谓普世性就是民族文化之间的相同、相通与相融。要打破封闭,放弃独白,要强调对话、沟通与理解,要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会中让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即经由创造性的转化而走向普世性的世界文化主潮。正是从这种文化观念出发,笔者认为,对西方文学中的希伯来精神的忽视与回避,是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倾向性问题,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

二

首先应该认真地审视一下我们对“两希文化”长期以来一褒一贬的态度。古希腊文化的价值指向是世俗人生,肯定人生的意义在于现世的幸福;而在古希伯来文化以及直接传承其文化精神的基督教所确立的人生方式中,人生意义的指针被拨向天国,它要求人们超越自己的世俗欲望,追求生命的永恒和灵魂的不朽。长期以来,古希腊文明和古希腊人的人生方式倍受推崇,古希腊人被我们看作是“健康正常的人类童年的代

表”。人们往往将古希腊的人生价值观称为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就是例证:“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4](P367)}这种“快乐”或“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人性中的多种功利性欲望被看作是合理甚至是神圣的内容。就古希腊文明而言,人本主义思想的确有它值得肯定和赞美的积极意义,它是古希腊海洋工商业文明和城邦民主制的产物。在人类野蛮专制的普遍压抑人性的古代世界中,古希腊文明不仅造就了独立特行的辉煌成就,而且也成为现代文明的源头。然而,它决非尽善尽美。

首先,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出现尽管是人类政治生活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存在许多致命的缺陷。它是一种直接民主,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和公共事务。所以,它只能存在于规模极为有限的城邦国家。很多学者都看到了希腊世界这一独特的历史状况:“埃及、苏美尔、中国,当然还有北印度,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从一些独立的城邦开始的。可是,它们从这种阶段,经历了一个合并的过程,进入了王国和帝国。但是希腊人,直到他们独立的历史终了都从来没有合并过。”^{[5](P311)}古希腊只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城邦国家的集合体。这种状况不仅使得这些孤立的城邦国力弱小无法抵御强大的专制帝国的入侵,而且城邦之间也是战争不断;希腊文明的消亡不仅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同时也是因为旷日持久的内战。然而一旦要结成联盟或形成统一强大的国家,专制就会出现,民主政治就会出现危机并最终走向崩溃,这是由希腊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就曾经与伯利克里一起指挥雅典海军镇压过企图脱离提洛同盟的萨摩斯人。在城邦民主政治内部,问题也同样存在。妇女、一定年龄以下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破产的负债人、定居的外邦人等等都没有公民权,更不用说那些奴隶了,社会等级制普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民主政治很容易堕落成多数人暴政,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只不过它是多数人专制。号称言论自由的雅典以投票表决的形式判决了因言论而“犯罪”的苏格拉底的死刑,恰好证明了他的言论的正确性。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希腊民主政治存在的合理性画上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句号。

应该看到,希腊民主政治的这种根本性的局限,与希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相互联系的。人本主义在肯定人生的价值在于世俗幸福的同时,实际上也确立了一种个人本位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原则,马丁·布伯称之为“我-它”关系,^{[6](P20)}即整个世界无论社会、他人、它物,相对“我”来说都是“它者”,“我”当以自我为本位,以功利为原则来确立自己与它者的关系。所以古希腊社会只有“公民平等”,而没有“人的平等”,也就不可能出现民族的平等、阶层阶级的平等和两性之间的平等。

以世俗幸福为人生的目的,还会带来人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性恶的膨胀,因为人的世俗欲望本身总是没有止境,而现实世界的财富总是有限的,仅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远远不够。延续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罗马就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希腊文化的局限与危机。在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的伟业背后,是千千万万被征服者的血泪;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每一块铺路石下面都有一个奴隶的冤魂在呻吟!当罗马公民在豪华的舞厅、饭店、妓院和浴室享受“世俗幸福”的时候,有多少奴隶在皮鞭之下劳作!正是在罗马斗兽场数万观众的喝彩声中,一个又一个健壮的奴隶和无辜的猛兽们倒在血泊之中!因为,相对于罗马民族、罗马公民阶层和每一个罗马人来说,其他民族、其他阶层和其他个体都是“它者”。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埃及、印度、巴比伦和波斯,专制独裁者为了自己的“世俗幸福”在这些古老的土地上延续着永无尽头的黑暗和罪恶,可是拥有城邦民主制的希腊和共和制的罗马竟然也不例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单纯奉行追求世俗幸福的人生价值观,以“我-它”关系原则来确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就必然会出现罪恶与苦难。然而,这种人生价值观是如此普遍,它似乎是人类一种“常态”的人生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如果不能从最根本的世界观上有本质性的突破,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希腊罗马文明走到这一步,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源自古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人生价值观出现了。首先,与世俗人生价值观相反的是它否定世俗幸福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同时认为人自身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局限。它认为在有限的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无限永恒的世界,在有限的人之上还有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绝对存在,即上帝。“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愿意赞颂你;这人遍体带着死亡,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遍体证明‘你拒绝骄傲的人’。”^{[7](P1)}在奥古斯丁这里,人的有限性是本质意义上的,仅仅依靠自己,人根本不可能确立生存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只有惟一的一个来源,那就是上帝。“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不存在,绝对不存在。”^{[7](P4)}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不在世俗的幸福,单纯的世俗生活没有幸福;要从彼岸的绝对世界来确立此岸的世俗世界存在的意义,从彼岸的真理来确立此岸世俗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超越自我本位,才能超越有限的世俗功利,避免因完全受自己欲望的支配而犯下的罪恶,才能“因信称义”,才能走上人生的坦坦正道,并最终获得永生。

其次,随着基督教人生价值观的确立,一种新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原则也确立下来了,马丁·布伯称之为“我一你”关系,与世俗人生价值观所确立的“我一它”关系形成鲜明对照。“我一你”关系原则将具有绝对意义的上帝作为直接称许的对象,以“你”呼之。拥有这一个“你”,生命就拥有了全部的意义,失去这一个“你”,则失去一切。同时,“我”还将通过上帝“你”来建立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一切以“你”为标准,这就与“我一它”关系中以自我为本位完全不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约》中让信徒“要爱邻如己”,甚至还要爱自己的仇敌。应该看到,“我一你”关系的出现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飞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实际功利,只有突破自我本位(包括个体本位、阶层阶级本位、民族国家本位等),以至真至善至美的绝对存在为本位,才能超越人的根本性的局限,建立自我与这个世界的真性联系。

第三,基督教人生价值观的出现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宪政的产生确立了必要的前提。在当今世界上,“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正在成为“普遍政体”。^{[8](P3)}“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可能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全人类永久的遗产”。但是,立宪政府的生成是否以存在一种宗教的和哲学的支持为先决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宪政论的起源”,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9](P1)}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一神论宗教确立了人与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不能成为神;另一方面,它确认人的原罪,也就是人在本质意义上的局限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神王”“天子”“圣君”存在的根据。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东方的埃及、印度、巴比伦,在他们的世俗人生价值观中,人神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某人或者可能是神的子女,或者能成神成佛成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位人中之“神”与其他人之间就不是量的区别而是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就会出现“至高无上”,“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而且,其他所有的人也将随着与这位人中之“神”的关系的远近而处于不同的等级之中。可以认为,专制制度的存在与这种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和多神宗教实际上就为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基督教却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观。正如有学者所言:“目前在西方自由社会通行的自由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10](P229)}基督教是惟一神信仰,人不能成神,上帝是惟一的绝对存在。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同时,基督教教义提出人是“因信而称义”,决定人生价值差异的惟一标准就是信仰,而不是外在的事功,这就超越了人的能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贫富、智愚的现实差异,从理论上确立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基础。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基督教度过最初的劫难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以后,它所面对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蛮族的欧洲,这些蛮族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与东方民族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经过基督教化以后,尽管历史学家们也还是把中世纪的欧洲称作封建社会,但实际上它已完全不同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就政治生活而言,由于基督教会确立了教权高于政权的观念,对于抑制欧洲封建王权进一步的专制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样,中世纪欧洲的教育、文化以及个体的精神生活相对于世俗政权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在东方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教会权力的膨胀,由人所组成的教会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当教会声称教皇不会犯错误,基督徒通往天国大门的惟一的钥匙握在教会手中时,它忘了这些原则恰恰正是违背基督教基本信条的。正因为有了基督教信仰这一思想武器,反对罗马天主教这些做法的“异端”代不乏人,并最终形成宗教改革的历史大潮。也正是由于基督教所确立的这些基本原则,基督教会最终才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集团,并最终摆脱了世俗独裁统治的合谋者的身份。

基督教人生价值观不仅使西方在古罗马晚期陷入末路的人生价值追求柳暗花明,而且也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我们才能理解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念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对西方文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也才能理解希伯来文学、基督教文学对整个西方文学的重要意义。

三

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调整高等院校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具体建议如下:国内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都

是把“古希腊罗马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第一章,我们认为应将“古希伯来与早期基督教文学”列为第二章,然后再衔接第三章“中世纪文学”。鉴于它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和我们长期以来对它的忽视,本章的分量不应少于第一章,甚至还应略重于它。内容可分为四节——概述、《旧约》、《新约》、早期基督教文学。这样做,一是根据西方文化的发展线索,因为基督教是古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融合;再则古希伯来文学与早期基督教文学本来就是中世纪文学的源头和先声,只有首先了解了古希伯来文学才能顺理成章地去面对中世纪文学;另外,现有的教材往往只是在东方文学部分介绍《旧约》、《新约》常常被忽视,这就割裂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使《旧约》与《新约》、古希伯来文学与早期基督教文学成为一个整体。

只有这样,才能还西方文学的本来面目。首先,两大源头都齐全了,西方文学内在的气脉贯通了,这两条主线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都因此而可以慢慢还原;其次,对西方文学内在精神的定位也会出现新的局面,这既是对希伯来精神的确立,也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准确定位。当然,后世西方文学中大量的主题、题材、意象、典故的来源也都有了出处,对人物的语言、行为、情感内涵与内在冲突等等,我们也会有更深的理解与体会。

这一调整对改变外国文学研究现状也可望有所贡献。第一,突破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的旧有格局。第二,改变当前外国文学界只谈技术不谈价值的现状。因为这一状况得以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旧的单一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框架内所包含的价值资源,如果不与希伯来精神和基督教观念形成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又互相激发互相融合的关系,就会逐渐枯竭;第三,改变现有的外国文学师资队伍和科研人员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与科研志趣,让他们去面对并开拓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天地。是所望也,敢不竭诚!

参考文献:

- [1] [英]吉尔伯特·默雷. 古希腊文学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2]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3] [法]谢和耐. 中国与基督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 [英]韦尔斯. 世界史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6] [以色列]马丁·布伯. 我与你[M]. 北京:三联书店,1986.
- [7] [古罗马]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8] [美]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9] [美]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0] [美]阿尔文·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Restore the Bible to Its Original Position—On the Teaching Orientation of Ancient Hebrew Literature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Yin Zhenqiu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gl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mpacts of ancient Hebrew literature on Western literatures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serious defect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f China. I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cient Hebrew literature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should be inserted in betwee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 and the Middle Ages literature. Only with this supplement,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inner development clue and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ner spiritual character of Western literatures. And a new situation will come into being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s.

Key words: the Bible; ancient Hebrew literature;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方晓明